

试论清初诗坛的宗唐界宋之风

黎孟德

(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, 四川 成都 610068)

摘要:明代前后七子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的主张,并没有带来诗歌的繁荣,而公安、竟陵的“性灵”之说,也没能纠七子之谬。清人要建立自己的诗歌格局,就不得不汲取明人的教训而另辟蹊径。虽然他们也有扬唐抑宋和扬宋抑唐之争,但是门户之见不深,而且与明人有本质的不同。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有识之士,主张唐宋兼宗,不必自狭道路。主张宗唐宗宋,应该师其心,师其意,而不应该专事词句外貌的模仿乃至剽窃。清代三百年之诗,远胜明人,清初诗人革路褴褛之功不可没。

关键词:清初诗坛;宗唐之风;宗宋之风;唐宋兼宗;钱谦益;门户之见

中图分类号:I207.22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0-5315(2005)05-0100-07

清代初年,当政权基本稳定,要构建自己的诗歌体系的时候,却遇到了和当年明人相似的尴尬境地。

唐诗和宋诗,以其不同的风貌、不同的特色、不同的手法、不同的追求,形成的两大格局,几乎囊括了古典诗歌所有的内容和形式,所有的风格和家数,后人要撇开它们另铸新型,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,唯一能做的事,就是向唐宋诗借鉴和学习。于是,整个明清两代诗坛,不外唐诗派与宋诗派之争。明代前后七子宗唐,公安、竟陵宗宋,形成针锋相对的两大营垒。

清初,论诗者承明人遗说,宗唐界宋之风尤炽,继七子者宗唐,嗣公安者宗宋。纳兰性德在《原诗》中说:“世道江河,动成积习,风雅之道,而有高髻广额之忧。十年前之诗人,皆唐之诗人也,必嗤点夫宋;近年来之诗人,皆宋之诗人也,必嗤点夫唐。万户同声,千车一辙。”[1](卷14)说的就是清初诗坛的这种状况。

一 清初的宗唐之风

明代之人论诗文,宗派之风最盛,往往各为界

说,相互攻讦,有时甚至言辞过当,势成水火。七子倡言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,已经是自狭道路。公安标举“性灵”,末流又入鄙俚一路,而竟陵以“孤怀”、“孤诣”^①,导诗歌于“幽深孤峭”一途,境界更为狭窄。因此,明末清初有识之士,纷纷弃七子、公安、竟陵而另觅新路,他们首先把眼光投向唐诗,说:“唐诗如父母然,岂有能识父母更识他人者乎?”[2](26—27页)

清初主唐诗者,有吴伟业、顾炎武、王夫之、王士禛、朱彝尊以及“虞山派”的冯班、冯舒,和与之交好的吴乔、贺裳等人。吴伟业与钱谦益并称明末清初诗坛的两大巨子,但吴氏与钱谦益不同的是很少对唐宋诗之争和七子、竟陵等发表评论,仅在《与宋尚木论诗书》中表明了一点宗唐的态度,而又对当时学唐之人有所不满。他说:

当今作者固不乏人,而独于诗一道,攻讦门户,排诋异同,坏人心而乱风俗,不能不为足下一言之。夫诗之尊李、杜,文之尚韩、欧,此犹山之有泰、华,水之有江、河,无不仰止而取益焉,

所不待言者也。……今之学者……于李、杜之
 高深雄浑者，未尝望其崖略，而剽窃一二近似，
 以号于人曰“我盛唐，我王、李”，则何以服竟陵
 诸子之心哉？[3]（卷39）

吴伟业专主唐诗的态度，主要表现在他的诗歌
 创作中。清赵翼《瓯北诗话·吴梅村诗》说：

梅村当国亡时，已退闲林下，其仕于我朝
 也，因荐而起，既不同于降表金名，而自恨濡忍
 不死，跼天踏地之意，没身不忘，则心与迹尚皆
 可谅。虽当时名位声望稍次于钱，而今日平心
 而论，梅村诗有不可及者二：一则神韵悉本唐
 人，不落宋以后腔调，而指事类情，又宛转如意，
 非如学唐者之徒袭其貌也；二则庀材多用正史，
 不取小说家故实，而选声作色，又华艳动人，非
 如食古者之物而不化也。盖其生平，于宋以后
 诗，本未寓目，全濡染唐人，而已之才情书卷，又
 自能澜翻不穷，故以唐人格调，写目前近事，宗
 派既正，词藻又丰，不得不推为近代中之大家。
 [4]（卷9，130页）

王夫之和吴伟业一样，也是明末遗民，他是明末
 大儒，著述丰富。他的论诗之语，后人辑为《姜斋诗
 话》一书。他以兴、观、群、怨论诗，推宗盛唐而不满
 晚唐和宋人。他说：

兴、观、群、怨，诗尽于是矣。……《诗》三
 百篇而下，唯“十九首”能然，李、杜亦仿佛遇
 之，然其能俾人随触而皆可，亦不数数也。又下
 或一可焉，或无一可者。故许浑允为恶诗，王僧
 孺、庾肩吾及宋人皆尔。

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，俱以意为主。意犹
 帅也。无帅之兵，谓之乌合。李、杜所以称大家
 者，无意之诗，十不得一二也。烟云泉石，花鸟
 苔林，金铺锦帐，寓意则灵，若齐、梁绮语，宋人
 拈合成句之出处，役心向彼掇索，而不恤己情之
 所自发，此之谓小家数，总在圈缊中求活计也。
 [5]（第8页）

王士禛与朱彝尊，一个是诗坛盟主，一个是词学
 巨擘，于诗，都主唐音。王士禛不太喜欢门户之见，
 论唐、宋诗之语不多见。他以为“唐诗主情，故多蕴
 藉；宋诗主气，故多径露。此其所以不及”[6]（153
 页）。朱彝尊则极力扬唐抑宋，他说：

予少而学诗，非汉、魏、六朝、三唐人语勿
 道，选材也良以精，稍不中绳墨，则屏而远之。

……今之言诗者，目不窥曹、刘之墙，足不
 履潘、左、陶、谢之园，顾厌弃唐人，以为平熟。
 下取苏、黄、杨、陆之体例，而又遗其神明，独拾
 渾滓。此犹杭人之结屋，伐荻芦以为筮，编竹以
 为簾，削板以为防，见者幸其成之速且易，一旦
 燎以火，其不化为烟尘土砾者罕矣。[7]（卷
 39）

以为宋诗取材不博，失之粗鄙。他对时人抑唐
 扬宋大为不满，说：

三十年来，海内谈诗者知嫉景陵邪说，顾仍
 取法于廷礼。比复厌唐人之规幅，争以宋为师。
 夫惟趋于博观汉、魏、六代之诗，然后可以言唐；
 学唐人而具体，然后可以言宋。彼目不睹全唐
 人之诗，辄随响附影，未知正而先言变，高诂宋
 人，诋唐为不足师，必曰：“离之始工。”吾未信
 其持论之平也。[8]（卷37）

今之言诗者，每厌弃唐音，转入宋人之流
 派，高者师法苏、黄，下乃效杨廷秀之体，叫嚣以
 为奇，俚鄙以为正，譬之于乐，其变而不成方者
 矣。[9]（卷38）

宋初“九僧”和林逋、潘阆、魏野等皆学晚唐，南
 宋末年的“四灵”和江湖诗人也多反对江西诗派而
 宗晚唐，但气象较晚唐贾岛、姚合等更为孱弱衰飒，
 因此引起元、明之人的不满，所以前后七子才明标
 “诗必盛唐”而黜晚唐与宋。这种思想，也影响到清
 初的宗唐之人。清初宗唐之人，有一些连晚唐皆所
 不取。如贺贻孙《诗筏》说：

看盛唐诗，当从其气格浑老，神韵处赏之，
 字句之奇，特其余耳。如王维……此等语皆晚
 唐人所极意刻画者。然出王、孟、张、岑手，即是
 盛唐诗；若出晚唐人手，即是晚唐人诗。盖盛唐
 人一字一句之奇，皆从全首元气中苞孕而出，全
 首浑老生动，则句句浑老生动，故虽有奇句，不
 碍自然。若晚唐气卑格弱，神韵又促，即取盛唐
 人语入其集中，但见斧凿痕，无复前人浑老生动
 之妙矣。[10]（174—175页）

但如此论诗，取法未免过严。其实明、清两代，
 已无盛唐气象，许多情况，倒与晚唐相似。明代公安
 派就已经主张“代有升降”，“法不相沿”，“各极其
 变”，“各穷其趣”[11]（211页）。袁宏道在《与丘长
 孺》中更说：

唐自有诗也，不必选体也；初、盛、中、晚自

有诗也,不必初、盛也;李、杜、王、岑、钱、刘,下迨元、白、卢、郑,各自有诗也,不必李、杜也。赵宋亦然,陈、欧、苏、黄诸人,有一字袭唐者乎?又有一字相袭者乎?至其人不能为唐,殆是气运使然,犹唐之不能为《选》,《选》之不能为汉、魏耳。[12](209页)

清初吴乔、冯班等人,稍稍举晚唐乃至昆体,而不专主盛唐,就是看到了时代的嬗变而风格不应单一。冯班是钱谦益弟子,与其弟冯舒都是“虞山派”中之健者。他不满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贬低中晚唐诗,在《钝吟杂录·严氏纠谬》中说:

沧浪曰:“禅家者流,乘有大小,宗有南北,道有正邪。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,悟第一义。若小乘禅、声闻、辟支果,皆非正也。论诗如论禅。汉、魏、晋与盛唐之诗,则第一义也;大历以还之诗,则小乘禅也,已落第二义矣;晚唐之诗,则声闻、辟支果也。学汉、魏、盛唐之诗,临济下也;学大历已还之诗,曹洞下也。”纠曰:“乘有大小是也,声闻、辟支则是小乘。今云大历已还是小乘,晚唐是声闻辟支,则小乘之下别有权乘,所未闻一也。……临济、曹洞机用不同,俱是最上一乘。今沧浪云大历已还之诗小乘禅也,又云学大历已还之诗曹洞下也,则以曹洞为小乘矣,所未闻三也。[13](卷5)

吴乔与冯班、贺裳声气相求,所见多同。他在《围炉诗话》自序中说:“一生困厄,息交绝游,惟常熟冯定远班、金坛贺黄公裳,所见多合。”[14](469页)他也主张不废晚唐,在《答万季野诗问》中说:

又问:“丈夫何故舍盛唐而为晚唐?”

答曰:“二十岁以前,鼻息拂云,何屑作中、晚耶。二十岁以后,稍知唐、明之真伪,见‘盛唐体’被明人弄坏,二李已不堪,学二李以为盛唐者,更自畏人,深愧前非,故舍之耳。”[2](27—28页)

吴乔的话,是很能代表清初一些人的看法的。

盛唐诗歌,在明代诗坛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,李梦阳、何景明、李攀龙、王世贞等前后七子鼓吹不遗余力。七子以复古自命,主盟文坛数十年,影响所及,至明季不替。但明人学唐,重在形貌,事摹拟,实剽窃,全无唐人气象,名虽高而成实不高。吴乔有一段话说得好:

读唐人之诗集,则可以知其人之情性、学

问、境遇、志趣、年齿。如《韵语阳秋》之评太白者,可以见太白诗从心出故也。读明人诗集,了无所见,以作者仿唐人皮毛,略无自心故也。夫唐无二盛,盛唐亦无多人,而自弘、嘉以来,百千万人,百千万篇,莫非盛唐,岂人才独盛于明,瑶草同于竹蔗蒹葭乎?[14](55页)

此语可谓一语中的。

清初学者有怨于此,对明人学唐的方法极为不满,称其诗为“瞎盛唐”^②,甚至贬为“蒙金木偶”^③或“土偶蒙金”^④,以为尚不及宋诗远甚。吴乔《围炉诗话·序》说:“唐诗有意,而托比兴以杂出之,其词婉而微,如人而衣冠。宋诗亦有意,惟赋而少从兴,其词径以直,如人而赤体。明之瞎盛唐诗,字面焕然,无意无法,直是木偶被文绣耳。”[14](469页)所以清之宗唐之人,却把矛头指向七子,认为是他们把诗歌的传统搞坏了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(丙集)“李副使梦阳”条说:

献吉生休明之代,负雄鸷之才,倏然谓汉后无文,唐后无诗。以复古为己任。信阳何仲默起而应之。自时厥后,齐吴代兴,江楚特起,北地之坛坫不改,近世耳食者至谓唐有李、杜,明有李、何,自大历以迄成化,上下千载,无余子焉。呜呼,何其悖也。何其陋也。……献吉以复古自命,曰古诗必汉、魏,必三谢;今体必初盛唐,必杜,舍是无诗焉。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,如婴儿之学语,如桐子之洛诵,字则字,句则句,篇则篇,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,古之人固如是乎?天地之运会,人世之景物,新新不停,生生相续,而必曰汉后无文,唐后无诗,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,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?献吉曰:“不读唐以后书。”献吉之诗文,引据唐以前书,纰缪挂漏,不一而足,又何说也。[14](311—312页)

尤其可怕的,是七子之名甚高,从者甚众。后之学者,表面看来是学盛唐,而实际却是学七子,乃至根本不知道盛唐为何物。吴乔说:“二李将盛唐弄坏,学者未得人盛唐,先似二李,大可畏人。”[14](593页)他还说:

青楼狹邪,良家子一入其门,身心俱变,纵欲从良,无由自脱,甚至甘为倡鹁,续置假女者。二李诗绝无意义,惟事声色,看之见好,为之易成,又冒盛唐之名,易于眩人,浅夫不察,一饮狂

泉,终身苦海。及乎伎俩已成,纵识得唐人门径,而下笔终不能脱旧调。始进之路,可不慎哉! [14](475页)

唐代诗歌的成就,是有目共睹的,尤其是盛唐诗歌,乃是一千多年来诗歌的不祧之祖。七子倡言诗学盛唐并没有错,错在学习的方法和选择的对象。唐代诗人,成就最高的是杜甫,对后代影响最大的也是杜甫。宋人学唐,说来说去,几乎都是学杜。清初诗人,也把眼光投向杜甫。叶燮就说:“统百代而论诗,自‘三百篇’而后,惟杜甫之诗,其力能与天地相终始。”[16](583页)明末清初,大力提倡尊杜的是钱谦益,他以极大的精力研究杜诗,写出《杜诗笺注》一书,影响很大。后来,他又奖掖王渔洋,使之在成为新的诗坛盟主之后,进一步推动对杜诗价值体系的认识。

二 清初的宗宋之风

《四库全书总目·精华录提要》说:“当我朝开国之初,人皆厌明代王、李之肤廓,钟、谭之纤仄,于是谈诗者竞尚宋、元。”[17](1522页)《唐贤三昧集提要》又说:“诗自太仓、历下,以雄浑博丽为主,其失也肤;公安、竟陵,以清新幽渺为宗,其失也诡。学者两途并穷,不得不折而入宋。”[17](1730页)

其实,在七子之论几乎一统诗坛的明代,就已经有人提出对宋诗的不同看法。前期有方孝孺、陈献章、庄昶等人,中后期有唐顺之、王慎中、茅坤等唐宋派作家,以及公安派诗人。比如方孝孺《谈诗五首》之二说:

前宋文章配两周,盛时诗律亦无俦。今人未识昆仑面,却笑黄河是浊流。[18](卷24)

都穆《南濠诗话》也说:

昔人谓诗盛于唐,坏于宋,近亦有谓元诗过于宋者,陋哉见也!刘后村曰:“宋诗岂惟不愧于唐,盖过之矣。”予观欧、梅、苏、黄、二陈至石湖、放翁诸公,其诗视唐未可便谓之过,然真无愧色者也。元诗称大家,必曰虞、杨、范、揭,以四子而视宋,特大山之卷石耳。[19](1344页)

公安三袁,皆好宋诗,尤喜东坡。袁宏道《与李龙湖》说:

苏公诗高古不如老杜,而超脱变怪过之,有天地来,一人而已。仆尝谓六朝无诗,陶公有诗趣,谢公有诗料,余子碌碌,无足观者。至李、杜而诗道始大。韩、柳、元、白、欧,诗之圣也;苏,

诗之神也。彼谓宋不如唐者,观场之见耳,岂真知诗为何物哉。[20](卷23)

但是,在元、明两代,唐诗独尊的地位并未改变,而宋诗则几乎落到覆瓿覆瓮的地步。直到明末清初,人们在对七子和钟、谭等人深深的失望中,才又重新对宋诗进行审视。清初的宗宋诗者,有宋荦、查慎行、厉鹗、黄宗羲、吕留良、叶燮等。宋荦、查慎行一生致力于苏轼诗的校刊注释;厉鹗编《宋诗纪事》100卷;吕留良、吴之振、吴自牧编《宋诗钞》106卷,意在张皇宋诗,在他们看来,宋诗一点也不比唐诗逊色,在有的方面,甚至还有过之。

厉鹗编《宋诗纪事》,在《序》中说:

宋承五季衰敝后,大兴文教,雅道克振。其诗与唐在合离间,而诗人之盛,视唐且过之。前明诸公剽拟唐人太甚,凡遇宋人集,概置不问,迄今流传者,仅数百家。即名公钜手,亦多散逸无存,江湖林藪之士,谁复发其幽光者,良可叹也。[21](卷首)

吴之振等编《宋诗钞》,在《序》中说:

自嘉、隆以还,言诗家宗唐而黜宋,宋人集覆瓿糊壁,弃之若不克尽,故今日蒐购最难得。黜宋诗者曰“腐”,此未见宋诗也。宋人之诗变化于唐,而出其自得,皮毛落尽,精神独存,不知者或以为“腐”。后人无识,倦于讲求,喜其说之省事而地位高也,则群奉“腐”之一字以废全宋之诗,故今之黜宋者,皆未见宋诗者也。虽见之,而不能辨其源流,则见与不见等。此病不在黜宋,而在尊唐。盖所尊者嘉、隆后之所谓唐,而非唐、宋之唐也。唐非其唐,则宋非其宋,以为“腐”也固宜。宋之去唐也近,而宋人之用力于唐也尤精以专。今欲以鹵莽剽窃之说,凌古人而上之,是犹逐父而称其祖,固不值宋人之轩渠,亦唐之所吐而不脍非类也。曹学佺序宋诗,谓“取材广而命意新,不剽袭前人一字”,然则诗之不朽,未有如宋者矣。[22](卷首)

宋荦称“余友吴孟举《宋诗钞》出,几于家有其书矣”[23](416页),可见其书为宋诗张目,影响之钜。

叶燮作《原诗》,对七子之扬唐抑宋极为不满,他说:

宋初诗袭唐人之旧,如徐铉、王禹偁辈,纯是唐音。苏舜钦、梅尧臣出,始一大变,欧阳修

亟称二人不置。自后诸大家迭兴,所造各有至极。今人一概称为宋诗者也。自是南宋、金、元作者不一,大家如陆游、范成大、元好问为最,各能自见其才。有明之初,高启为冠,兼唐、宋、元人之长,初不于唐、宋、元人之诗有所为轩轻也。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,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,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,无异于唾骂。谓唐无古诗,并谓唐中、晚且无诗也。噫,亦可怪矣!今之人岂无有能知其非者,然建安、盛唐之说辄习沁于中心,而时发于口吻,弊流而不可挽,则其说之为害烈也。[16](566—567页)

他对于七子抑中晚唐诗也不以为然,他认为中唐韩愈上承盛唐,下启两宋,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诗人:

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,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,其力大,其思雄,崛起特为鼻祖。宋之苏、梅、欧、苏、王、黄,皆愈为之发其端,可谓极盛。而俗儒且谓愈诗大变汉、魏,大变盛唐,格格而不许,何异居蚯蚓之穴,习闻其长鸣,听洪钟之声而怪之,窃窃然议之耳。[16](570页)

他和公安派、黄宗羲等一样,对苏东坡尤为推崇:

如苏轼之诗,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,天地万物,嬉笑怒骂,无不鼓舞于笔端,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,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,而盛极矣。[16](570页)

明人门户之见太强,宗唐者把宋诗说得一无是处;宗宋者又把唐诗说得一钱不值,为诗者对似唐者一毫不取,走向另一个极端。这种情况在清初也存在,即前引朱彝尊所谓“今之言诗者,每厌弃唐音,转入宋人之流派”。叶燮对此也极为不满,他说:

近今诗家,知惩七子之习弊,扫其陈熟余派,是矣。然其过,凡声调字之句近乎唐者一切屏弃而不为,务趋于奥僻,以险怪相尚,目为生新,自负得宋人之髓,几于句似秦碑,字如汉赋,新而近于俚,生而入于涩,真足大败人意。[16](591页)

唐诗是古典诗歌的最高典范,宋诗则是宋人另辟蹊径的创新,是对唐诗最好的继承和发展。明人过分极端的扬唐抑宋或扬宋抑唐,事实证明是失败的,也最终没有能创制出所谓的“明调”。在这一点上,清初的学者要比明代的学者清醒得多,所以许多宗唐者并不完全贬抑宋诗;宗宋者也并不完全贬抑唐诗。比如宗唐的吴乔就说:“宋人不可轻也,宋诗

如三家村叟,布袍草履,是一个人。明诗土偶蒙金。”[2](27页)贺贻孙《诗筏》也说:

严沧浪云:“唐人与宋人诗,未论工拙,直是气象不同。”此语切中窾要。但余谓作诗未论气象,先看本色,若赏郎效士大夫举止,暴富儿效贵公子衣冠,纵气象有一二相似,然村鄙本色自在。宋人虽无唐人气象,犹不失宋人本色。若近时人,气象非不甚似唐人,而本色相去远矣。[10](181页)

又说:

宋人诗佳者,殊不愧唐人,多看可助波澜,但须熟看唐人诗,方能辨宋诗苍白。盖宋之名手,皆从唐诗出,虽面目不甚似,而神情近之,如人耳孙十传以后,犹肖其祖。[10](194页)

但是,无论扬唐抑宋也好,扬宋抑唐也好,最终都仍然难免重蹈明人的覆辙,都未必是构建清诗格局的最佳选择,所以,以钱谦益为首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唐宋兼宗的主张。

三 唐宋兼宗的诗学走向

明代诗歌,派别最多,争论最烈,但明代诗歌,前不及唐、宋,后不及清。究其原因,不外两途。明代诗人,或尊显前人以自高身份,如七子;或贬抑前人以抬高自己,如公安、竟陵,最终都没有找出一条正确的出路,所以为后人所讥。说到底,还是门户之见太深,相互攻讦排斥,有时不免意气用事,立论便失公允。清初学者有鉴于此,虽有尊唐界宋之争,但门户之见不深,相互攻击不多。矛头所指,几乎都在明人。更有人明指门庭之害,如王夫之就说:

建立门庭,自建安始。……唐初比偶,即有陈子昂、张子寿抗扬大雅。继以李、杜代兴,杯酒论文,雅称同调。而李不袭杜,杜不谋李,未尝党同伐异,画疆默守。沿及宋人,始争疆垒。欧阳永叔亟反杨亿、刘筠之靡丽,而矫枉已迫,还入于枉,遂使一代无诗,掇拾夸新,殆同觴令。胡元浮艳,又以矫宋为工,蛮触之争,要于兴、观、群、怨丝毫未有当也。伯温、季迪以和缓受之,不与元人竞胜,而自问风雅之津。故洪武间诗教中兴,洗四百年三变之陋。[5](15—16页)

立门庭者必短钉,非短钉不可以立门户。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,无从开方便法门,任陋人支借也。人讥“西昆体”为獾祭鱼,苏子瞻、黄鲁直亦獾耳。彼所祭者,肥油江豚,此所

祭者吹沙跳浪之鲙鲨也。[5](17页)

王夫之把七子、竟陵等人的诗比作“教师棋”，认为只有刘基、高启、刘曷、贝琼、汤显祖等人，不立门户，不受宗唐界宋的束缚，才称得上是“昭代风华”。他说：

一解奕者，以诲人奕为游资。后遇一高手，与对弈，至十数子，辄挪揄之曰：“此教师棋耳。”诗文立门庭，使人学己，人一学即似者，自诩为大家，为才子，亦艺苑教师而已。高廷礼、李献吉、何大复、李于麟、王元美、钟伯敬、谭友夏，所尚异科，其归一也。才立一门庭，则但有其格局，更无性情，更无兴会，更无思致。自缚缚人，谁为之解者？昭代风雅，自不属此数公。若刘伯温之思理，高季迪之韵度，刘彦曷之高华，贝廷琚之俊逸，汤义仍之灵警，绝壁孤骞，无可攀蹶，人固望洋而返，而后以其亭亭岳岳之风神，与古人相辉映。次则孙仲衍之畅适，周履道之萧清，徐昌谷之密贍，高子业之戍削，李宾之之流丽，徐文长之豪迈，各擅胜场，沈酣自得，正以不悬牌开肆，充风雅牙行，要使光焰熊熊，莫能揜抑，岂与碌碌余子争市易之场哉。李文饶有云：“好驴马不逐队行。”立门庭与依傍门庭者，皆逐队者也。[5](14—15页)

可谓一针见血。只有破除门户之见，才能改变“党同伐异”、“画疆默守”的陋习。也只有破除门户之见，才能以平和公允的心态来看待唐、宋之诗。

明末清初，主张唐宋兼宗，尊唐而不卑宋，影响最大的是钱谦益。

钱谦益的主要活动时间在明末，这时，支撑着七子宗盛唐诗歌的理论的虚幻“盛世”光环，已经不复存在，倒是晚唐和宋，尤其是南宋的情况还有些相似，兼之七子的创作未惬人意，唐宋派和公安、竟陵的兼宗晚唐及宋的诗文理论就必然产生，甚至出现了“万历之际，海内皆誉王、李”[24](《陶仲璞遁园集序》)的局面。

钱谦益的诗歌理论渊源于公安派和唐宋派，一方面，对七子的“学古而贗”大加挞伐，一方面，对竟陵的“幽深孤峭”痛下针砭。他指斥“近代之学诗者，知空同、元美而已矣，其哆口称汉、魏，称盛唐者，知空同、元美之汉、魏、盛唐而已矣。自弘历至于万历，百有余岁，空同雾于前，元美雾于后，学者冥行倒植，不见日月。甚矣两家之雾之深且久矣”[24]

(《黄子羽诗序》)，痛诋钟惺“其所谓深幽孤峭者，如木客之清吟，如幽独君之冥语，如梦而入鼠穴，如幻而之鬼国”[15](“钟提学惺”条，570页)，谭元春“才力薄于钟，其学殖尤浅”，其诗“无字不哑、无句不谜，无一篇章不破碎断落。一言之内，意义违反、如隔燕、吴；数行之中，词旨蒙晦，莫辨阡陌”[15](“钟提学惺”条附“谭解元元春”条，572—573页)。

钱谦益是尊唐的，但指出七子之病在“不善学”，在“生吞活剥”，他在《曾房仲诗序》中说：

余盖尝奉教于先生长者，而窃闻学诗之说，以为学诗之法，莫善于古人，莫不善于今人。何也？自唐以降，诗家之途辙，总萃于杜氏。大历后之诗名家者，靡不由杜而出。……本朝之学杜者，以李献吉为巨子。献吉以学杜自命，鞞警海内。比及百年，而鞞警献吉者始出，然诗道之敝滋甚，此皆所谓不善学也。夫献吉之学杜，所以自误误人者，以其生吞活剥，本不知杜，而三必如此乃为杜也。今之鞞警献吉者，又岂知杜之为杜，与献吉之所以误学者也。[24](928—929页)

钱谦益不卑宋，以为诗道进步，“生生不穷”，“新新相续”，他在《题徐季白诗卷后》说：

嗟夫！天地之降才与吾人之心灵妙智，生生不穷，新新相续。有《三百篇》则必有楚骚；有汉、魏、建安则必有六朝；有景德、开元则必有中、晚及宋、元。而世皆遵守严仪卿、刘辰翁、高廷礼之警说，限隔时代，支离格律。[25](卷47)

钱谦益的身世经历复杂，毁誉参半，但他领袖文坛的地位却是不容动摇的。他登高一呼，也能应者影从，影响所及，不仅仅是虞山一派而已。

但是说到底，唐宋兼宗仍然仅仅是一个学习模仿的过程，要建立清诗的格局，需要有清人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风格。清人之不满意于七子，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自己的风格特色。倒是高启、宋濂、刘基、汤显祖、徐文长等人，不立门户，各有特色，写眼前之景、心中之事，受到清人的赏识。

清代三百年之诗歌，超越明代，直追唐宋，与清人不严门户，唐宋兼宗，自成风格，求变创新，形成较为宏大的格局是有很大关系的，而清初诸子在这一过程之中，功不可没。

注释:

- ①谭元春《诗归序》：“夫人有孤怀，有孤诣，其名必孤行于古今之间，不肯遍满寥廓。”见郭绍虞《中国历代文论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218页。
- ②吴乔《围炉诗话》：“明之嗜盛唐诗，字面焕然，无意无法，直是木偶被文绣耳。”见《清诗话续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472页。
- ③吴乔《围炉诗话》：“以初盛视中晚，如京朝官之于下僚；以初盛视弘、嘉，如京朝官之于蒙金木偶。”见《清诗话续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554页。
- ④吴乔《答万季野诗问》：“明诗土偶蒙金。”见《清诗话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，第27页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纳兰性德. 通志堂集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.
- [2] 吴乔. 答万季野诗问[A]. 郭绍虞. 清诗话[Z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63.
- [3] 吴伟业. 梅村集[M]. 文渊阁四库全书[M/CD]. 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1997.
- [4] 赵翼. 瓯北诗话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63.
- [5] 王夫之. 姜斋诗话[M]. 郭绍虞. 清诗话[Z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63.
- [6] 王士禛. 师友传灯续录[A]. 郭绍虞. 清诗话续编[Z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63.
- [7] 朱彝尊. 鹄华山人诗序[A]. 曝书亭集[M]. 文渊阁四库全书[M/CD]. 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1997.
- [8] 朱彝尊. 丁武诗选序[A]. 曝书亭集[M]. 文渊阁四库全书[M/CD]. 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1997.
- [9] 朱彝尊. 叶李二使君合刻诗序[A]. 曝书亭集[M]. 文渊阁四库全书[M/CD]. 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1997.
- [10] 贺贻孙. 诗筏[M]. 郭绍虞. 清诗话续编[Z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3.
- [11] 袁宏道. 叙小修诗[A]. 郭绍虞. 中国历代文论选[Z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0.
- [12] 袁宏道. 与丘长孺[A]. 郭绍虞. 中国历代文论选[Z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0.
- [13] 冯班. 钝吟杂录[M]. 文渊阁四库全书[M/CD]. 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1997.
- [14] 吴乔. 围炉诗话[M]. 郭绍虞. 清诗话续编[Z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3.
- [15] 钱谦益. 列朝诗集小传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59.
- [16] 叶燮. 原诗[M]. 郭绍虞. 清诗话续编[Z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3.
- [17] 纪昀.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[Z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5.
- [18] 方孝孺. 逊志斋集[M]. 文渊阁四库全书[M/CD]. 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1997.
- [19] 都穆. 南濠诗话[M]. 丁福保. 历代诗话续编[Z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3.
- [20] 袁宏道. 袁宏道集校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1.
- [21] 厉鹗. 宋诗纪事[Z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3.
- [22] 吴之振. 宋诗钞[Z]. 文渊阁四库全书[M/CD]. 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1997.
- [23] 宋莘. 漫堂说诗[A]. 郭绍虞. 清诗话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63.
- [24] 钱谦益. 初学集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5.
- [25] 钱谦益. 有学集[M]. 四部丛刊初编·集部[Z]. 上海: 涵芬楼影印本, 1926.

[责任编辑: 唐 普]